

## 第二章 《內部參考》的定位及由來

「參考類消息」是中共特有的出版品，它們不僅限量出版，種類繁多之外，中共更設下限制，只允許某些級別以上的幹部才能閱讀。《內部參考》及《參考消息》均屬於中共新華社出版的「參考類消息」。新華社是中共建國以後的唯一官方通訊社，也是唯一可提供新聞給報紙、媒體的通訊社，為什麼新華社要自己出版《內部參考》？《內部參考》如何演進？有哪些特色？

### 一、內部參考的定位

中共很多單位及機構均有類似「參考類消息」的出版，供決策者參考或監控下屬所需。根據曾擔任過新華社記者的何川回憶，「參考類消息」依其報導內容及保密程度，可分為「參考系列」與「內參系列」兩大種類：

#### 1. 參考系列

「參考系列」是由新華社「參考資料編輯部」和「國際新聞部」負責編輯，最早的前身即是1931年的《參考消息》，日後種類逐步增多，其新聞來源則是將國外新聞機構或是通訊社，彙整成冊後，提供給領導者參考。約可細分為以下幾類：

(1)《參考消息》：1931年創刊，為四開四版日報，是1955年《參考資料》尚未出版前中共幹部瞭解國際形勢的主要刊物。此刊物可供訂閱，但不公開售賣，也不接受國外訂戶。五〇年代初期只允許領導幹部訂閱，1956年毛澤東擴大其發行範圍，到六〇年代幾乎所有幹部（包括大學生）均可訂閱，七〇年代工人連也可以閱讀，到八〇年代則任何老百姓均可私人訂閱。隨著訂閱範圍的擴大，外電內容的刪節越來越多，外電對於中國的評論，經常只擷取讚揚的部分，偶然留下一些小批評，已無神秘色彩。

(2)《參考資料》：1955年創刊，過去是每天上、下午各一本，現在則是日刊，每天百餘頁。發行範圍是司局級、軍隊師級、以及地方的區市級，但中央機構外事部門的處級也能看到。它詳細介紹世界各地重要的政治、經濟新聞，以及各國對於中國大事的反映。最大特色是將前一天世界各地的大事件及前因後果均

作詳盡介紹，故很受中共高層領導重視。毛澤東在1959年3月曾說：「現在的報紙我只看一些消息，但是《參考資料》、《內部參考》每天必看<sup>1</sup>。」

(3)《參考要聞》：1955年創刊，每日發行，每次約十頁，主要刊載外國新聞機構電訊稿的概要，為《參考資料》摘要，屬「機密級」，是中共中級幹部瞭解世界動態的重要讀物，發行範圍等同於《參考資料》<sup>2</sup>。但是因為份量少，閱讀方便，深受歡迎。

「參考系列」在中共的對外決策的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風波迭起的1956年。根據吳冷西的回憶，是年3月10日《紐約時報》刊載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全文之後，新華社立即組織人員翻譯，刊印於《參考資料》，分送中央各領導幹部閱讀。蘇共二十大後，中共政治局常委幾乎天天開會，吳冷西在出席之前，必定先到新華社的「參考資料編輯部」瞭解當天收到的最新消息<sup>3</sup>。當時負責《參考資料》與《參考消息》具體工作的李慎之回憶說：「波、匈事件以後，毛主席就想到，他所得到的最多的消息都是從《參考資料》上來的<sup>4</sup>。」由此可知《參考資料》是中共高層領導瞭解國際時事最倚賴的管道。

## 2. 內參系列

「內參系列」由新華社的「國內新聞編輯部」第二編輯室負責編輯和發行，建政後才出現，形成的時間比「參考系列」為晚，大致有以下幾個種類：

(1)《內參副頁》：通稱為「手抄件」。此類報導涉及重大敏感問題，如黨內權力鬥爭，中央和國家重要機關發生的問題，軍隊、政法系統出現的重大事件。它是不定期發行，由於內容多涉及敏感，第二編輯室通常只對原稿件作一些技術處理，直接透過熱線，或用傳真將稿件傳達到有關人物手中，保密程度為絕密級，

---

<sup>1</sup> 衛廣益，〈毛澤東與大小“參考”〉。

<sup>2</sup> 何川，〈中共新聞制度剖析〉，頁193-194。

<sup>3</sup> 朱元石主編，〈共和國要事口述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162、168。

<sup>4</sup> 邢小群，〈李慎之敘往〉，詳見：<http://personal.nbnet.nb.ca/stao/xingxq001.htm>（作者於1996年10月整理完成，2003年2月25日上網刊登）。

一般發送範圍只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級領導幹部。

(2)《內參清樣》：又稱為「國內動態清樣」，它同樣反映國內重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和突發性事件，內容也包括黨內高層或有重要影響人物的講話或建議等。《內參清樣》也是不定期發行，每天一、二期，有時五期以上。保密程度也是絕密級，發行範圍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級以及有關的部委負責人，1986年經胡喬木建議後<sup>5</sup>，才將發行範圍擴大到包括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

(3)《內部參考》：主要登載國內重大事件，具有指導意義的工作經驗、重要的理論動態。文章主要來自「國內動態清樣」中具有代表性與政策指導性的報導，另外還有新華社記者就有關國內重大政治、經濟等問題進行的綜合性調查報導。《內部參考》每週二期，含有較大的信息量，保密程度為「秘密」級，發行範圍包括行政上的處級，及縣團級，它是中共中高級幹部獲取秘密資訊的重要管道。

(4)《內參選編》：內容主要來自上面幾種內參資料，每週一期，保密程度為「秘密」級，發行範圍至行政上的科一級，及鄉營級<sup>6</sup>。

當然，這麼龐雜的「參考類消息」體系並非一朝一夕就形成的。參考類消息的出現最早可溯至1931年1月，紅軍在國民黨發動的第一次圍剿戰役中，擄獲了無線電收報機和發報機，馬上利用這些機具進行紅軍的軍事聯絡，並兼抄收國民黨中央社的電訊和敵軍間的通訊，這些訊息便成為最早的參考類消息。同年11月，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紅色中華通訊社（紅中社）便在會議期間抄收國民黨的電訊廣播，編印成《參考消息》，發給到會的代表參閱，這是第一次出版參考類消息。自此，編輯參考類消息即成為紅中社的日常工作之一<sup>7</sup>。即使是在條件極為嚴苛的「長征」途中，紅中社仍然抄收國內外電訊，不曾中斷一日，以便即時提供黨中央決策者參考<sup>8</sup>。

抗日戰爭爆發後，新華社（1937年1月，紅中社更名為新華通訊社，簡稱新華社）仍然持續抄收國內外通訊社的電訊，但擴大範圍，在國民黨中央社及日本同

<sup>5</sup> 何川，《中共新聞制度剖析》，頁184。

<sup>6</sup> 何川，《中共新聞制度剖析》，頁180-185。

<sup>7</sup> 劉雲萊，《新華社史話》，頁2-4。

<sup>8</sup> 劉雲萊，《新華社史話》，頁8。

盟社之外，增加海通社、路透社、塔斯社及美國國際新聞社等較大通訊社。同時，也恢復《參考消息》的刊印，供中央領導和各機關參閱，每期約400份<sup>9</sup>。不過，參考類消息所提供的訊息對毛來說還是不能滿足其研究國內外形勢的需要，他常常晚上親自到新華社的駐地看剛抄收並譯出的參考電訊。抗戰期間，毛便是依賴著這些電訊及《參考消息》對時局做出分析與判斷，如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便是毛澤東分析外電報導後寫出的作品<sup>10</sup>。

抗戰結束後，國共衝突白熱化，內戰旋即展開。1947年3月，蔣介石派遣胡宗南部隊直撲延安，中共中央決定暫時撤出延安，「轉戰陝北」，新華社也奉命撤出。但為了確保轉戰時黨中央能及時獲取各地消息及戰況情報，將部份新華社的人員組成一支小分隊，跟隨行動，這支部隊的代號為「四大隊」，由副總編輯范長江擔任領導，其主要任務有四：（一）負責黨中央與太行新華總社之間的聯絡；（二）把抄收到國民黨中央社和外國通訊社電訊，編輯油印成《參考消息》，並將新華社新聞稿編成《新聞簡報》，供中央領導及中央機關參閱；（三）將每天收到的電訊加以初步整理和分析，對重要時事政治問題作初步研究，以供中央領導同志參考，為此還成立了專門研究室；（四）幫助並領導西北（新華）總分社及西北前線分社，領導西北戰場的軍事新聞報導<sup>11</sup>。

中共建政以後，出版參考類消息仍是新華社主要業務之一<sup>12</sup>。由於事務的繁多，參考類報導的數量及種類也不斷擴大，本論文的研究對象《內部參考》即創刊於1949年9月。

綜觀參考類消息的演進歷程，可以發現參考類消息起初大多刊載敵情，且工作人員隸屬於紅軍，故自起初即具有濃厚的軍事色彩，屬於電子情報的一部份；但江西時期成立紅中社以後，抄收國內外通訊的範圍擴大，人員也從當初的紅軍轉為具備專業知識的記者，並也開始對時事和對時事政治問題進行初步研究。到抗戰爆發前夕，從業人員也從當初的紅軍轉為文人記者，紅中社改名歸屬新華社，

---

<sup>9</sup> 劉雲萊，《新華社史話》，頁16。

<sup>10</sup> 衛廣益，〈毛澤東與大小“參考”〉。

<sup>11</sup> 劉雲萊，《新華社史話》，頁73。

<sup>12</sup> 劉雲萊，《新華社史話》，頁100。

繼續做同樣的工作。這使得參考類消息除了原本的情報色彩之外，更增添了向中央領導匯報新聞的功能。

換句話說，就機構及人員而言，參考類消息是由記者採寫，經新華社出版，以提供中央領導參考的訊息，因此可以算是新聞的一部份；但其中的內容事涉敏感，並限定人員閱讀，又蒙上一層情報的色彩。因此，參考類消息位處新聞與情報之間，既有兩者色彩，又全然不屬於兩者，具有自己獨立的地位，這種定位正是參考類消息的獨特之處。

筆者閱讀1949年至1965年的《內部參考》後發現，它自1949年9月22日創刊，星期一至星期六均有刊行，例假日則無。起初每期刊載3-5則消息，1953年後則擴大為8-10則。1956年後配合漢字簡化，內容改為橫排，消息量增大為每期15則左右。若遇到突發狀況，更會刊行專號，如1953年11月採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後，12月3日便針對此一政策刊出〈全國各地糧食統購統銷工作情況〉，專門介紹各大區及若干省分的實施情況<sup>13</sup>。令人玩味的是，它的頁碼並非每期歸零，也不是以整年為單位來編碼，而是採用不固定的方式。如1953年大致上是以每月一日做為基準歸零，1957年每期歸零，1958年則不固定，甚至出現在月中（6月20日）頁碼歸零的情況。究其原因，可能是為了保密需要，故意混淆頁碼。此外，每期的刊頭上都印有數字，方便洩密時用以追查。

《內部參考》刊載國內重大新聞，又具有保密措施，承襲了參考類消息位處於新聞與情報之間的定位。但將《參考消息》與《內部參考》相比較可以發現，中共針對後者進行較為嚴密的保密，原因可能是《參考消息》主要是將國外各新聞機構的新聞加以改編而成，對一般的平民畢竟有段距離、較無切身關係；但是《內部參考》不僅僅抄收外電消息，更派記者前往中國各地，主動蒐集國內發生的事件，其揭露的內容與部分平民有直接的關係，可能直接危及中共統治基礎，動搖人民對於社會主義的信心，因此保密程度更高，未像《參考消息》一樣，讓人民廣為訂閱，這是本文選擇《內部參考》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

<sup>13</sup> 〈全國各地糧食統購統銷工作情況〉，《內部參考》，1953年12月3日，頁39-58。

## 二、形塑內部參考的因素

中共《內部參考》刊載的內容其實並非關於組織內部的事務，而是國內外發生的重大新聞事件。中共一向主張人民當家作主，為何卻要大費周章另設《內部參考》來報導國內大事，且設下層層防護以防止內容外洩？為何只讓高級幹部閱讀其中的內容，一般人民卻無從一窺奧秘？

以下便將分別探討形塑《內部參考》的因素：

### 1. 中共對於新聞的時時控制

中共在其建黨以後有關新聞宣傳的第一個決議中，即明白要求任何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包括新聞刊物，應由黨員直接經辦和編輯，並且不得刊載違背黨的方針、政策和決定的文章<sup>14</sup>。顯示了中共早在創建伊始，就相當重視對新聞的控制。

中共何以要對新聞進行嚴密的控制？這起因於中共對於「新聞」有自己的見解。中共自詡其新聞學的觀點為「人民新聞學」，長期擔任新華社社長的吳冷西對於「人民新聞學」的基本原則有過這樣的解釋：

人民新聞學的基本原則，是以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為依歸，對此有利的多多報導，對此利少者則少報導，對此無益甚至有害者則不報導，反對客觀主義和所謂「有聞必錄」<sup>15</sup>。

基於這樣的新聞觀，中共認為為新聞的存在是以「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為依歸」，人民只需要知道有益的新聞，不需要知道無益的新聞。那麼，誰是人民？又是誰來界定何種新聞有益？何種新聞有害？自然是身為「無產階級先鋒隊<sup>16</sup>」的中共來決定。

---

<sup>14</sup>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摘宣傳部份）〉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冊（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頁1。

<sup>15</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中冊，頁117。

<sup>16</sup> 列寧認為雖然工人階級雖然是共產革命的主要力量，但一開始是沒有階級覺悟的，必須透過由職業革命家所組成的共產黨向工人灌輸共產主義思想，激發工人的階級覺悟。因此，共產黨即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政治感覺較一般工人為高，是領導者。

中共新聞觀形成的來源其一是來自於馬列主義的意識型態。馬列主義視新聞為「上層建築<sup>17</sup>」中的一部份，屬於統治工具，沒有獨立性，必須依附於某一階級。換言之，新聞是具有階級性的。

既然新聞具有階級性，那麼新聞報導也如同階級一般，要進行劃分。尤其是歐美通訊社的報導。就中共的觀點早就認定這些通訊社是被「資產階級所掌控」的，帶有「毒素」，爲了保持大眾的思想純潔，必須把這些報導隔絕。將新聞報導加以區分，也就是對新聞進行管制，不認爲大眾有知的權利。

同樣也基於意識型態，認爲新聞是統治工具，「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去佔領<sup>18</sup>」。因此，新聞必須牢牢掌控在中共手中，爲無產階級革命服務。毛澤東就曾指出：「報紙對於工作及人民來說，有極大的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的作用<sup>19</sup>。」他深知新聞媒體可以動員群眾，宣傳革命思想，用來建立或鞏固政權。

毛澤東更明白地說：「一個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個生產隊，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sup>20</sup>。」毛澤東的意圖再明顯不過了：對新聞必須加以控制，不能危及中共的統治地位。

此外，對於共產黨人來說，意識型態是他們理解世界的藍圖及未來行動綱領的依據，但馬列主義畢竟只提供一套概略的藍圖，對於實際上所可能遭遇的問題及困難，則沒有確實的解決方案。因此，在遇到這些情況時，就必須根據馬列主

<sup>17</sup> 馬克思認爲社會結構主要分成兩大部分，一是經濟基礎，另一是「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是指由社會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係的總和，是構成一定社會的基礎；上層建築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意識型態以及與其相適應的制度、組織和設施，在階級社會主要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設施。馬克思也認爲在階級社會，上層建築具有階級性。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統治階級的思想則形塑了政治法律制度等上層建築。這裡所指出的「精神生產資料」，即包括新聞。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32。

<sup>18</sup> 人民日報編輯部，《論黨的新聞工作》（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0），頁72。

<sup>19</sup> 毛澤東，〈給劉建勳、韋國清的信〉，《新聞工作文獻選編》，頁88。

<sup>20</sup>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台北：新銳出版社，1994），頁152。

義進行延伸式的解釋，以求一方面維持立基於意識型態的正當性，一方面能解決問題。亦即，掌握「解釋權」就等於掌握統治的正當性<sup>21</sup>。而新聞正是進行意識型態解釋最公開的方式。因此，牢牢將新聞掌控在黨的手中，也就佔領了意識型態解釋權最重要的陣地。

基於這樣的新聞觀，中共逐步建構起一套新聞控制制度。首先便是建立由黨直接控制的通訊社，以便對新聞的採訪及傳播能更有效地進行干涉。此外，中共還成立「中央黨報委員會」，主要職責是代表中央政治局領導並監督中共所有報刊的言論活動<sup>22</sup>。

中共建國之後，政務院立即在1949年12月9日制定了〈關於統一發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重要新聞的暫行辦法〉，規定凡需經過中央人民政府委會、政務院、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署通過或同意的一切公告，以及需經上述機構負責首長同意後發布的一切公告性新聞，均由國家通訊社及新華通訊社統一發布<sup>23</sup>。1950年更公佈了〈全國報紙雜誌登記暫行辦法草案〉，規定凡出版報紙雜誌均須向當地新聞出版行政機構申請登記，並由當地新聞出版行政機構擬具初審意見，轉呈新聞總署核定，發給登記證後，才能出版發行<sup>24</sup>。透過這兩項法令，除了透過登記制度對所有的新聞媒體進行控管之外，有關國家的重要大事，也統一由新華社發布。這等於宣告人民雖然有言論自由，但卻無法成立獨立自主的新聞社及出版社，必須受中共的監督。

這套制度大抵有兩大著力點：一是中共先建立起自身的新聞通訊社，再賦予其黨內新聞總匯的角色，以使黨的對外發言口徑一致。建國之後，中共擴大新華社的功能，使其負擔起全國「新聞總匯」的角色，來對新聞訊息的來源進行控管，尤其是對國內發生的大事統一口徑報導；二是透過登記制度，對全國的傳媒進行控制，防止他們超出中共所設定的「官方說法」。

---

<sup>21</sup>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186。

<sup>22</sup>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365-366。

<sup>23</sup> 劉雲萊，《新華社史話》，頁141。

<sup>24</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冊（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頁11-12。



中共最高層領導者一直牢牢掌控這套新聞控制制度。早自新華社的前身—「紅色中華社」開始，就一直是由張聞天擔任頂頭上司，張聞天歷任中共宣傳部部長、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總書記，1940年以後，他分管宣傳教育部門，是中共黨內嫻熟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大師」<sup>25</sup>。毛澤東掌握大權以後更加強對新華社的控制，不僅新華社與延安《解放日報》是整風的重點，甚至連轉戰陝北之時，都還親自帶著一部分的新華社人員以了解國內外動態。建國以後，新華社歸屬新聞總署管轄，而當時新聞總署的負責人即是毛澤東的大秘書—胡喬木。

不是僅有共產黨人所領導的政府才會進行新聞控制。對於所有的政府來說，都希望能對新聞媒體進行或多或少的控制：將有利於統治的新聞大肆報導，以收宣傳之效；將不利於統治的新聞加以掩蓋，避免引發民怨。但是大多數的國家無法壟斷媒體，也必須面對民主自由價值觀的對抗。相較之下共黨國家奉行「無產階級專政」<sup>26</sup>，採行黨國體制，以共產黨為核心，對全國的一切資源進行控制，以黨領政，以黨領軍，以黨領群，所以對媒體的控制更為徹底且明顯。

中共稟持其「人民新聞學」的觀點，為了掌握意識解釋權，遂行無產階級專政，鞏固黨國體制，而對新聞進行嚴格的控制。順此觀點出發，由黨營的新聞通訊社—新華社擔當「新聞總匯」，從中過濾出「對人民有益的報導」，再交由《人民日報》刊登，以收宣傳、組織大眾之效。

## 2. 調查研究

毛澤東在其著名的文章〈實踐論〉中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他認為萬事萬物皆有矛盾與鬥爭，導致事物向前發展，人們也必須透過親身經歷，變化自己的觀念，改正自己的錯誤。他舉例道：「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

---

<sup>25</sup> 指王明、博古、張聞天。

<sup>26</sup>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主張，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293。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sup>27</sup>。」

根據〈實踐論〉，毛澤東要求幹部作任何工作時，除了利用中央所提供的政策號召為基礎之外，更要深入了解群眾的意見，透過實踐的經驗來轉化號召成為適合當地的政策。他認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sup>28</sup>。」這即是著名的「群眾路線」。

中共深知只憑單一管道來收集訊息，指揮群眾，可能造成下情無法上達，從而導致政策執行上的失敗，並且無從矯正。因此，毛澤東要求幹部透過實踐來了解政策的執行情況與群眾反映。但要如何「實踐」才能貼近群眾呢？當然可以透過許多方式，「調查研究」是其中的一種方式，也是毛澤東親自主張和大力提倡的。但毛澤東也明言「調查研究」有一個重要前提：中央所提供的政策號召<sup>29</sup>。這顯示了先有政策，後有調查研究，調查研究並非任意調查，而是有目的性的，旨在讓中央政策便於在地方實施，而非懷疑中央政策。

基於「群眾路線」的特色，中共往往利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推動、執行政策，中共自己將群眾運動的邏輯過程歸納為：情況－工作－問題－經驗<sup>30</sup>，在每一個階段中，調查研究都被要求應用，以獲取有關資訊，中共更明白指出：「要怎樣使每一個步驟真正達到領導與群眾結合的要求呢？此中唯一的關鍵是要看在每一步驟上，領導方面以集體創作方式走群眾路線，運用調查研究的方法的決心與成效而定<sup>31</sup>。」這裡點出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它是聯繫黨（領導）及群眾的關鍵樞紐。

早在井崗山時期，毛澤東便大力提倡「調查研究」，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

---

<sup>27</sup>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264。

<sup>28</sup> 〈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854。

<sup>29</sup> 毛澤東將這種從中央由上至下的政策宣達稱為「一般號召」。1943年整風，他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號召外，必須在自己機關中和附近機關、學校、部隊中，選擇二、三個單位，深入研究，詳細了解整風學習在這些單位的發展過程。可以發現「一般號召」首先提出，之後再進行調查研究。見：〈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852。

<sup>30</sup> 中共自己認為群眾運動的歷程都包括以下的幾個階段：（1）情況的調查、分析、研究；（2）工作的計畫、佈置、督促、檢查；（3）問題的發生、提出、研究和解決；（4）經驗的檢討和總結。見：編者不詳，《中共調查研究工作之方法》（台北：陽明山莊印，1951），頁11。

<sup>31</sup> 編者不詳，《中共調查研究工作之方法》（台北：陽明山莊印，1951），頁14。

中，毛澤東認為如果對一個問題沒有進行調查，就不可能知道問題的根源及情況，因此，「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sup>32</sup>」；此外，針對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了解這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才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用毛澤東的話說，「調查就是解決問題<sup>33</sup>」。不僅流於口號而已，毛本身也付諸實踐，其著名的《鄴鄔調查》即是他親身前往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後的總結，

《鄴鄔調查》的內容大致分為兩個主要部分，首先，毛澤東針對鄴鄔的商業、農業人口，及他們日常的活動進行調查，尤其特別重視分析社會各個階級的情況與互動；第二部分則調查分配土地政策的實行情況與農民對此項政策的反應。《鄴鄔調查》成為日後中共進行調查研究的參考範本。

透過對《鄴鄔調查》的分析，可以發現中共的調查研究有兩大目的。一是針對社會各個階級做調查，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毛澤東便明白指出：「我們調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種社會階級，我們的終極目的是要明了各種階級的相互關係，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後定出我們正確的鬥爭策略<sup>34</sup>。」毛特別強調要研究各個階級的「階級估量」，意即對於土地革命的支持態度，其目的是要了解「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以作為發動群眾運動的第一步。二是利用調查研究以蒐集民眾對於政策的反應，以《鄴鄔調查》為例，群眾發現地方幹部在分田時獨得好田，引起群眾不滿，縣政府把好田收回補給群眾，群眾才高興。因此發現到表面上的「抽多補少」無法引起農民支持，農民更為關心實質上的「抽肥補瘦」，畢竟好田才有高產量。透過《鄴鄔調查》，中共進一步改善土地平分政策，在原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抽多補少」的基礎之上，增加了「抽肥補瘦」原則，使之能獲得更多農民的支持。

也就是說，中共透過調查研究來了解社會情況，並蒐集輿情對政策的反應，以修正政策、矯正失誤，來贏得民眾對政府的支持。中共即是基於此一目的，設置《內部參考》，供給高級幹部閱讀。

<sup>32</sup> 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頁1。

<sup>33</sup> 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頁2。

<sup>34</sup> 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頁6。

依照毛澤東的意圖，利用調查研究以蒐集民意應該成爲黨幹部日常重要的活動之一，然而，就實際層面而言，調查研究費時費力，且隨著中共統治區域的日漸擴大，事務日漸複雜，高層幹部無法花費大量時間下鄉進行調查研究。因此，此一工作也轉爲由專門人員負責，這些專門人員即是新聞記者，和統一指揮黨內傳播事務的新華社。

### 3. 訊息的顛覆性

中共透過賦予新華社擔任新聞總匯的地位，來對新聞進行控制；同時也利用它及所屬記者來報導國內外發生的大事，提供訊息以供高層領導參考。

但並非所有的新聞訊息均有利於中共，以民意爲例，若新聞消息報導民眾的正向反應，對中共當然有益，這顯示了中共的統治受到了人民的支持，當然要公開報導在《人民日報》上，以獲得更多迴響；但若是負面反應，等於表示中共的統治出了問題，必須加以封閉，以免使民心動搖，這類負面的消息對中共來說即具有「顛覆性」，因爲此類消息將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心與造成社會的不安定，甚至形成統治上的危機。

然而，中共何以指派新華社將這些不宜公開的「顛覆性」訊息另結成冊，編成包含《內部參考》等諸多的「參考類消息」，提供幹部閱讀？

1956年底，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擴大〈參考消息〉訂閱範圍的通知》，將本來僅限於黨內的高級領導幹部的《參考消息》，擴大發行到縣委以上或相當於縣委的黨內外幹部，並計劃將發行數量由兩千份增加到30到40萬份，後來甚至擴及到大專院校學生也可閱讀<sup>35</sup>。這個事件正好提供一個機會，來探究這個問題。

毛澤東突然爲何要把《參考消息》的閱讀範圍擴大？毛首先在1957年1月27日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進行如下的說明：

---

<sup>35</sup> 衛廣義，〈毛主席倡議創辦《參考消息》〉

[http://www.gmw.cn/content/2004-06/04/content\\_38711.htm](http://www.gmw.cn/content/2004-06/04/content_38711.htm)（2004年6月4日）。

現在，我們決定擴大發行《參考消息》，從兩千份擴大到40萬份，使黨內黨外都能看到。這是共產黨替帝國主義出版報紙，連那些罵我們的反動言論也登。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擺在我們同志面前，擺在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面前，讓他們受到鍛鍊。不要封鎖起來，封鎖起來反而危險。這一條我們跟蘇聯的做法不同。為什麼要種牛痘？就是人為地把一種病毒放到人體裡面去，實行「細菌戰」，跟你作鬥爭，使你的身體裡頭產生一種免疫力。發行《參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種牛痘」，增強幹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sup>36</sup>。

這個決定並非空穴來風，乃是毛澤東試圖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中的一環。1956年，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緊接著下半年發生波蘭、匈牙利事件，許多人一時之間感到無法接受，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內部應該不會再有矛盾存在」，難以理解波蘭和匈牙利為何會發生大規模的暴亂<sup>37</sup>。

許多民眾不知道的是，同時國內也發生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要求退社等情況，不過，這些可能引發民心向背的失序現象均透過《內部參考》報導給中共高層知曉，毛澤東因此思考這些現象之所以產生的根源，尤其重要的是，中共如何能不犯斯大林的錯誤，又能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形成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張，並透過多次會議向幹部進行說明。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敵我矛盾，另一類是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解決敵我矛盾靠壓服敵人，靠無產階級專政；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則必須依靠耐心的說服。而波蘭、匈牙利事件爆發的原因，就是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人民內部矛盾，並且用壓服的方式來處理，加以有心人士的煽動，從而形成大規模的暴亂。

<sup>36</sup>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頁185。筆者認為：毛澤東此時決定擴大《參考消息》的閱讀範圍應與他提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相關，同樣在這場會議中，毛澤東也論及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可能試圖透過擴大《參考消息》的閱讀範圍來緩解人民內部矛盾。

<sup>37</sup> 如《內部參考》在1956年11月5日便刊出〈江西師範學院的師生由波匈事件聯想到社會主義制度是否優越的問題〉、〈北京各界對波匈事件發生很難理解〉、〈安徽省合肥市機關幹部和民主黨派對波匈事件提出的一些疑問和猜測〉。

面對社會主義社會發生鬧事，毛澤東從辯證法的角度加以分析，認為任何社會都有對立的兩面，之後透過鬥爭達成統一，毛比喻道：

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美是跟醜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善惡也是這樣，善事、善人是跟惡事、惡人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總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sup>38</sup>。

毛也點出長期接受單一觀點的危險：

禁止人們跟謬誤、醜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跟孔子、老子、蔣介石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臺戲<sup>39</sup>。

因此毛要求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要：

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不懂得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沒有同這些反面的東西作過鬥爭，你那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不鞏固的。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份子的缺點，恰恰是對於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麼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東西，就駁不倒它<sup>40</sup>。

既然香花是透過和毒草做鬥爭才發展出來的，且結果必然是香花壓倒毒草，那麼讓毒草放出來就是無害的。因此，毛要求幹部不僅要閱讀孔子、康德的著作，甚至是蔣介石的書，並且擴大發行《參考消息》，來瞭解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各式各樣的衝突，並且讓幹部知道事物的複雜性，避免幹部因訊息管道單一而發生思想僵化的現象。進而才能「以理服人」，以說服的方式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此外，中共也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探討了斯大林為何犯錯

---

<sup>38</sup>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92。

<sup>39</sup>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92-193。

<sup>40</sup>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頁193

誤的原因：

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領導人物的責任是要儘量減少錯誤，儘量避免某些嚴重的錯誤，注意從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中取得教訓，力求使某些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不至於變成全國性的、長時期的錯誤。而要達到這種目的，就要求每個領導者都十分謹慎和謙遜，密切地聯繫群眾，遇事和群眾商量，反復地調查研究實際的情況，經常進行適合情況的、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斯大林，在他後一個時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嚴重的錯誤，就是因為他沒有這樣做<sup>41</sup>。

斯大林犯錯的根本原因，即是沒有密切聯繫群眾，沒有利用調查研究來進行自我檢討。中共記取此一教訓，不僅擴大發行《參考消息》，1956年後《內部參考》的內容較之前也有所增加，似乎顯示了中共藉著增加反映輿情的數量，以使幹部更爲重視這類顛覆性訊息，利用記者所作的調查研究，來改進施政上的缺失，避免重蹈斯大林錯誤的覆轍。

中共雖然擴大《參考消息》的發行範圍，但並未隨之擴大《內部參考》的閱讀限制。究其原因，可能是《參考消息》報導均是外電消息，以國際情勢及外國情況爲主，與民眾較無直接關係；但《內部參考》主要刊載國內大事，與民眾切身相關，較爲敏感，因此不予開放。

中共雖然主張人民當家作主，但向來就不認爲「人民」是一個同質的整體，在「知」的權利上也就有所區別，大陸學者高華就清楚說明了這個現象：

群眾有左、中、右的劃分，黨員幹部中也有左、中、右之區別。既然人之有區別，在「知」的權利上就不能不反對「絕對平均主義」。中低級黨員幹部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準不足以抗禦國內外新聞報刊散佈的「毒素」的侵襲，因此只有久經考驗的少數高級幹部才有資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聞消息，幹部級別越高，閱讀限制就越小，由此逐級而遞減。至於一般普

<sup>41</sup>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227-228。

通老百姓，為了保證他們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純潔性，就沒有必要讓他們知道黨報以外的其他消息了<sup>42</sup>。

中共清楚了解許多新聞有「顛覆性」，不能隨意報導，而對新聞進行控制。但對幹部而言，中共一直要求幹部聯繫群眾，利用調查研究以便制訂和執行政策，因此幹部需要了解真實情況，知道政策執行中的複雜性，所以幹部需要知道這些「顛覆性」的新聞，中共也認為這一些人黨性堅強有免疫力，可以抵抗「顛覆性」新聞所帶來的「毒素」。

為了同時保護普通老百姓思想上的「純潔」；又要給幹部「打預防針」，了解真實情況，中共想出了解決的辦法：就是將這些不宜公開的新聞另結成冊出版，供給幹部閱讀、參考，如此一來可以擴大幹部的訊息面，以使幹部能發現問題，加以解決；同時也可以將這些訊息控制在黨內或有限的範圍，不使其擴大。這即是《內部參考》產生的原因。

---

<sup>42</sup>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374。